

# 先达和棉兰的文教报业的锻炼

##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一)3

经常会在他们作业上,留下或长或短的评语,以资鼓励。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但有些评语对个别“情窦初开”的女学生,或许会引起不必要的善意的误读,致使她想入非非。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写评语须慎重。

1952年12月29日,北苏门答腊青年总会(简称“苏北青总”)第三届代表大会,决定在先达华侨中学未完全竣工的校舍举行。我参加了大会的组织接待工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大会,也是青总历史上规模最大、与会代表人数(300多人)最多、代表性最为广泛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所以选择在先达召开,是因为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进步力量较强,基础较好。

要开好这样一次大会,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一个具有很强掌控能力、且能耳听八方、以理服人的领导者。当时主席团主席陈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会分成好几个组,讨论的议题也很多。诸如青总在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加强与当地印尼工青妇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如何在华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既爱国又爱侨的青年骨干、如何广泛争取团结蓝派商人、青年学生,孤立少数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

每天各组的讨论简报都集中到陈洪那里。如何从大量简报中捋出头绪,抓住问题本质,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地写出一份令人信服的总结报告,这是摆在陈洪面前的一大挑战。结果陈洪赢得了这场挑战。他的能力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这次青总代表大会取得历史性成就,是与陈洪的出色领导分不开的。

陈洪在先达中华学校任校长时,我听过他上的大课。他以左手掌比喻中国版图,深入浅出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他的口才和智慧,令我折服。

他是棉兰华侨抗日地下组织(华抗)的领头人,也是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领导人之一。

这也让我想起1958年,我从驻雅加达大使馆因公出差到驻棉兰领事馆,当时请陈洪到领事馆协助起草一份有关当地侨情的报告,我也参与其中。他的综合概括能力,再次令我佩服。我从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1999年,陈洪应邀参加北京国庆50周年庆典,后因重感冒住进协和医院。10月下旬,我曾到医院看望他。他跟我谈起出版“苏岛九·二〇事件”纪念册的问题。他说,他看过我在《世界知识》写的文章,也知道我曾经是该刊的主编。他是提出要我主编《忘不了的岁月》的第一人。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这是后话。

① 1943年9月20日凌晨,日军出动几乎所有在岛军警,对华侨抗日组织领导和成员进行抓捕,在黑沉沉的夜幕下,警笛犬吠枪声响彻大街小巷,血雨腥风笼罩全岛。直至早晨6点钟,几乎毫无思想准备的华侨抗日组织领导和成员100多人被捕。随即日军将他们投进监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问。

### 投入新闻媒体

青总大会一结束,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我即被调到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工作。

报社工作给我提供一个与教育界完全不同的发展平台。报社两年,经历了不少事。我担任印尼文电讯和报刊编译,副刊编辑、外勤记者、还负责报社玻璃橱窗布展中国新闻社发来的介绍新中国各种图片的印尼文翻译工作。

一身兼四职,工作量大,工资高,很锻炼人。

《民报》创刊于20世纪20年代。创办人是棉兰国民党元老叶燕浅。30年代,叶去世,把股权遗留给三个儿子:贻

昌、贻东、贻芳。贻昌也是国民党人,占大股,有话语权。

《民报》政治倾向受国民党控制。

二战后,贻昌受国共内战影响,对办报失去兴趣,把股权割让给亲民主派的贻东、贻芳双胞胎兄弟。

我进入报社时,叶贻芳任《民报》印务局总经理,朱培璋任民报社长兼主笔,林革尘任总编辑。朱、林都是老报人,他们的学识、文笔都很出众。我后来因工作关系才知道林是地下党员。

棉兰有三家华文报纸:《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和《新中华报》。前两者亲民主派,后者为国民党喉舌。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红蓝两派报纸经常发生笔战。《民报》在政治上采取温和路线,多刊登经济商业讯息,以争取中间派,特别是广大浅蓝读者和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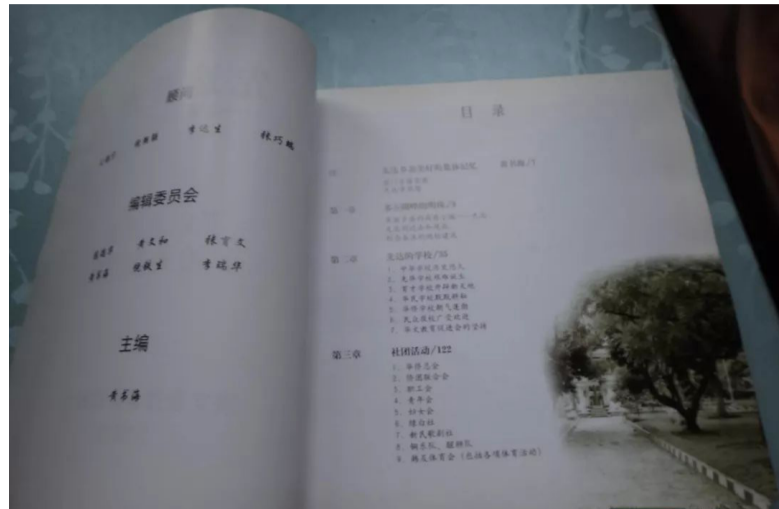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民报》确定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1953年发生丹绒莫拉哇事件。当地印尼军警用拖拉机无端铲平华农住房和农田,引起严重冲突。我以《民报》记者身份前往现场采访。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当地华农和有关警,并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采访。

采访完毕,我离开现场不到10分钟,有一名军警从马路对面向我刚才站立的地方发射了一梭机关枪子弹,所幸无人伤亡。我也躲过了一劫。回棉兰时,大雨滂沱,路面很滑。我们的车没有减速,开得很快。结果中途遇到险情,司机急刹车,车子调了一个头,没有侧翻,司机和我冒出一身冷汗。又躲过了一劫。万幸。

印尼第一届语言文字全国代表大会在棉兰召开。我应邀出席大会参加采访。

会上,我见到了印尼学术界一些名人,并聆听他们精彩的讲演。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位学者:先后担任过教育文化部长的穆哈默



《先达照片 高原小城的故事》主编黄书海

德·雅明教授和普里约诺教授。他们的讲演是大会的主旨发言,质量水平最高。

印尼语言文字产生的历史虽不算悠久,但它很先进,优美。胡愈之赞誉,为东方的意大利语”。印尼是多民族的国家,方言不少。当印尼文被确定为印尼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文字时,它在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共和国的斗争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它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印尼文造诣。大会散发的主要文件和资料,我一直保留至今,十分珍贵。

到了年终,报社总要进行回顾和总结。编辑部分门别类,各自提出改进、创新计划。而林革尘总编提出年终专稿的设想,并分头约稿。

承蒙林总厚爱,分配我撰写一篇专稿,分析和综述1953年印尼政局发生的变化。当时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这说明一年来我在报社的工作和写作能力,受到总编的肯定。

由于平时我较注意跟踪印尼时局发展,并随手搜集有关资料,我对写好这篇专稿充满信心。我在预定的时间内提前交稿,以便林总审改。

林总改了标题和开头几句话,使文章显得更为干练老道。这就是水平的差距。

这篇专稿几乎占了一整版,读者反映不错。因此第二年(1954年)年终有关印尼形势

的专稿还让我写,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在报社,我十分敬重朱培璋主笔。在我工作的那两年里,《民报》每篇社评,几乎都出自他手。

我喜欢看他的社评。文笔流畅,寥寥数语,人木三分。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来上班。写完社评,回家吃饭。如下午有活动,吃过晚饭,便来写稿。为赶着排版,他写完一页,我下楼取一页,送林总审阅。楼上楼下,穿梭几次,一篇高质量的社评就产生了。他头脑清晰敏锐,是有名的快手。

培璋生活很有规律,烟酒不沾,也不大吃大喝。而林总恰恰相反,每天要抽好几包烟。我和他一个办公室,不知抽了多少二手烟。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毛骨悚然”。

每年我都享有两周带薪假期。1954年初,林总编带我和一位年青的新闻收录员一起到巴东、武吉丁宜、巴耶公务、西丹布安等地观光旅游,并顺道了解有关抗日战士、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经过和尸骨埋葬地点。

1942年初,日军攻占新加坡。郁达夫、巴人、胡愈之等文化人流亡到苏岛西部。几经辗转,郁达夫在巴耶公务隐蔽下来,并以经营“赵豫记”酒厂作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他化名“赵廉”。

郁和当地一位华侨姑娘陈莲有(后改名何丽有)成了家。育一男一女。新中国成